

庐陵王学研究

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肖慧 王公山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庐陵王学研究

肖慧 王公山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庐陵王学研究/肖慧,王公山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7

ISBN 978 - 7 - 210 - 10606 - 7

I. ①庐… II. ①肖… ②王… III. ①陆王学派 - 研究 - 吉安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4523 号

庐陵王学研究

肖 慧 王公山 著

责任编辑:吴艺文

封面设计:章 雷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330006)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47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93

网 址:www.jxpph.com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22.5

字 数:480 千

ISBN 978 - 7 - 210 - 10606 - 7

赣版权登字—01—2018—61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68.00 元

承 印 厂: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江右王学在阳明王学中的地位极为显要。在阳明后学的各流派中,江右王门学者众多,学术活动频繁,是阳明后学中最重要的学术流派。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如此评价江右王学的地位:“姚江(王阳明)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①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也有近似的评价:“江右王门是指明代江西地区的王学传人。他们在传播王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均超过其余王门学派。”②黄氏和侯氏如此定论,甚为精当。而黄氏所列江右六位王门传人(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塘南、思默)中,除思默系属南昌东溪人外,其余五位籍贯都属庐陵。重要的江右王学领袖,如安福的邹守益、吉水的罗洪先、泰和的欧阳德、永丰的聂豹等,均出生于庐陵。加之《宋明理学史》所列江右王门一系,诸如邹守益(号东廓)、欧阳德(号南野)、胡直(号庐山),还有后期的刘元卿(号泸潇)、邹元标(号南皋)等,亦均出自庐陵境内。面对如此壮观的学术现象,我们不禁惊叹,也令世人仰慕。这是灿烂的庐陵文化深厚底蕴孕育的结果。这充分表明,明代中叶以后的庐陵的确是江右阳明王学的中心。进一步说,明代中叶以后的庐陵亦确实是阳明王学研究的重镇。这是其一;其二,《明儒学案》中所列江右阳明学者计 33 位,除一人外都是江右人,而在 32 位江右阳明学者中,有 22 人为庐陵学者,占江右阳明学者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若将何心隐与颜钧计算在内,其比例更高。由此可见,江右阳明学者主要集中在庐陵境内,庐陵王学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此外,黄氏所提的江右王学的四大老:邹守益、罗洪先、聂豹、欧阳德等不仅均出身于庐陵内,而且他们的讲学活动除欧阳德外,其余多集中于庐陵境内,这些庐陵王门的弟子们,以他们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阳明心学的独到体悟,共同叙写了一部

① 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第 33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第 28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独具特色的庐陵王学历史。

本书首先重点介绍了庐陵王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界定和特点以及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如(一)草创期(1508—1517),其主要特点为:1. 地域特色,主要集中于庐陵境内的安福县;2. 早期王学主要以接受、学习与传播为存在形式;3. 当时王学队伍中成分复杂等。此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刘晓、刘邦采、刘文敏、刘秉监等。(二)发展期(1517—1529),其主要特点为:“信守师说派”(又称“正统派”)与“归寂派”的代表人物登场,为此时期的重要标志。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除草创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外,主要还有:邹守益、聂豹、欧阳德、罗洪先、王钊、刘魁等。(三)鼎盛时期(1529—1577),其主要特质:标志一,青原讲会的成功举办;标志二,“归寂派”的成熟;标志三,邹氏家族王学学者的崛起;标志四,永新人颜钧在王艮处学通“大成”之说。其代表人物有:除三舍刘氏、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刘魁外,还有安福的邹氏父子、安福的朱氏家族及王氏家族以及陈嘉谟、宋仪望、胡直、颜钧等。(四)式微期(1577—),刘邦采的谢世标志着兴盛的庐陵王学开始式微了。其标志为:庐陵境内的王学水平呈现式微状态,讲学之风也逐渐式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邹元标、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罗大纮、刘元卿等。其次,我们从庐陵王学发展的四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中挑选了其中的九位重要学者,分别对他们的治学理路、心学思想、经学特色等进行重点研究和阐发,力求使读者从总体上了解庐陵王学的概貌以及其形成、发展、分化、演变乃至式微的历史过程和重要代表人物的王学思想,使世人重新了解和审视庐陵王学在江右王学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正如黄氏所说:“邹东廓之戒惧,念庵之主静,此真阳明之的传也。”又曰:“彰阳明之学者,不在讲席遍天下之门人,而在孤高绝俗之门人,如两峰、念庵之徒是也。”此论十分精当,充分展现了庐陵王学的显著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传承、弘扬阳明王学的作用。此亦激发我们自觉担负起作为明代中叶以后的江右王学的中心和王学研究重镇的庐陵学者的历史使命,对庐陵王学的发展演变,作出系统性的思想史的总结,向国内外读者奉献我们进一步探索庐陵王学各主要学者的学术思想、学术特点和学术成就以及其深刻影响的一点成果。同时通过我们的研究探索,揭示庐陵王学历史发展脉络和研究的现实意义,为进一步推动庐陵王学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多元和谐的新文化,特别是丰富和提升灿烂的庐陵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品位贡献我们的知识与心力。拙稿方成,覃思未已。唯因我们的理论知识和学术水平有限,以及时间等诸多原因,对庐陵王学学者的学术思想和思想宗旨等的探索和研发若有不到位之处,诚望专家学者以及读者,不吝赐教,我们诚恳求教于学界同仁。

目
Contents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王阳明政治生平	2
第二节 王阳明学术理路	5
第三节 王阳明的世界观	10
第四节 王门分流与江右王学的形成	16
第二章 庐陵王学简史	19
第一节 三舍刘氏与庐陵王学的草创期	19
第二节 庐陵境内王学的发展期	29
第三节 庐陵王学的鼎盛期	40
第四节 庐陵王学的式微期	56
第五节 庐陵王学的地位	67
第三章 邹守益的王学思想	73
第一节 邹守益生平简介	73
第二节 邹守益的心学思想内容	77
第三节 邹守益的经学思想	101
第四章 欧阳德的王学思想	109
第一节 欧阳德生平简介	109

第二节 欧阳德的心学思想内容	112
第三节 欧阳德的经学思想	124
第五章 聂豹的王学思想	138
第一节 聂豹生平简介	138
第二节 聂豹的心学思想内容	141
第三节 聂豹的经学思想	156
第六章 罗洪先的王学思想	172
第一节 罗洪先生平简介	172
第二节 罗洪先学术思想之演变	174
第三节 罗洪先的心学思想内容	180
第四节 罗洪先的经学思想	197
第七章 胡直的王学思想	214
第一节 胡直生平简介	214
第二节 胡直的心学思想内容	217
第三节 胡直的经学思想	229
第八章 王时槐的王学思想	241
第一节 王时槐生平简介	241
第二节 王时槐的心学思想内容	244
第三节 王时槐的经学思想	264
第九章 颜钧的王学思想	272
第一节 颜钧生平简介	272
第二节 颜钧的心学思想内容	274
第十章 邹元标的王学思想	299
第一节 邹元标生平简介	299
第二节 邹元标的王学思想	300

第三节 邹元标的经学思想	320
第十一章 刘元卿的王学思想	325
第一节 刘元卿生平简介	325
第二节 刘元卿的心学思想内容	326
第十二章 结语:庐陵王学的历史地位	345
主要参考文献	349
后记	354

第一章 絮 论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如此评价江右王学的地位：“姚江（王阳明）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①吕思勉在《理学纲要》中亦云：“王学流传，梨洲《明儒学案》，分为七派（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其崭然见头角者，实惟浙中、江右、泰州。江右最纯谨。”^②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也有近似的评价：“江右王门是指明代江西地区的王学传人。他们在传播王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均超过其余王门学派。”^③黄氏与侯氏如此定论，甚为精当。以儒家“三立”标准而言，王阳明^④一生所建功业，主要在江右完成，其学说的“知行合一”精神也在江右得以较为完美地体现。江右弟子，不仅亲耳聆听阳明学说之精髓，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过程中能够亲身感受到阳明学说的精神，因此也更能够深刻地领会到阳明学说的内涵，这可能是黄氏等人立论的主要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黄氏所列的江右六位王门传人（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塘南、思默）中，除思默系属南昌东溪人外，其余籍贯都属于庐陵境内。即使东溪人思默，其学脉也承传了念庵，这也正如黄氏所云的“念庵之学得先生而传”^⑤。《宋明理学史》所列江右王门一系，诸如邹守益（号东廓）、欧阳德（号南野）、聂豹（号双江）、罗洪先（号念庵）、刘邦采（号师泉）、王时槐（号塘南）、胡直（号庐山），均出自庐陵境内^⑥，面对这种学术现象，我们不仅惊叹，这是历史

① 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第33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② 吕思勉：《理学纲要》，第191—19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③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第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④ 按：为了行文方便，除标题、引文、多数章、开始和其他特殊情况外，以下凡王阳明多简称为阳明。

⑤ 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第50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⑥ 按：庐陵本为旧区划名，今指吉安。广义的庐陵指整个地级吉安市，狭义的庐陵指庐陵县[今吉州区、吉安县、青原区（不含天玉镇、富滩镇）范围]，本书指广义上的庐陵，即吉安市。

的巧合,抑或出于逻辑的必然? 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明代中叶以后的庐陵,的确是江右阳明王学的中心。进一步说,明代的庐陵,也的确是王学研究的重镇。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对庐陵王学的地位重新审视,对其研究成果作出新的评价,尽可能还原庐陵王学的真实面貌。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在研究庐陵王学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阳明的生平功业与学术成就作出简要的评述。

第一节 王阳明政治生平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9),谥号文成。阳明祖籍浙江余姚,青年时随父亲迁徙至阴山(越城),后来他在距越城不远的阳明洞天结庐,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他是明代富有传奇色彩的儒学大师,黄宗羲认为:“无姚江(阳明),则古来之学脉绝矣。”^①当代学者陈来认为阳明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是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②

阳明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父亲王华为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据记载,阳明生有异质,卓然不群,11岁就对读书的目的是科举登第提出质疑,^③并且少年的阳明并非是安分守己的“好学生”,性格“豪迈不羁”,且时常逃学,率领同伴做军事游戏。13岁丧母,因遭受庶母虐待,阳明竟买通巫婆来捉弄庶母,使得庶母从此改变了态度。^④ 15岁出游居庸关、山海关,总览山川形胜,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17岁奉命到洪都(今南昌)迎娶诸氏为妻,从此便与江西结下不解之缘。21岁乡试中举,但接下来的两次进士会试均以落第告终。面对科举失利,阳明却十分坦然:“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⑤

弘治十二年(1499),28岁的阳明得举进士,次年上陈《边务八事》疏,提出一系列切中时弊的军事政策,当年授刑部主事,后改兵部武选司主事。

① 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第17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②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1页,三联书店,2009。

③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2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④ 冯梦龙:《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明墨憨斋新编,弘毅馆雕本。

⑤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2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正德元年(1509),35岁的阳明以其“直节”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第一次沉重打击。当时,年仅15岁的明武宗即位不久,就起用宦官刘瑾,架空内阁。刘瑾专权,朝政日非。朝中大臣联名上疏切谏罢免刘瑾,却遭刘瑾矫诏陷害,被关进监狱甚至迫害致死。阳明抗疏救人,结果被廷杖四十,贬谪贵州龙场。龙场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不仅蛇虺成堆,瘴疠流行,当地官员也经常刁难,生命时刻受到威胁。正是在如此逆境之中,阳明体悟到了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

至正德五年(1510),奸宦刘瑾被除,阳明遂迁江西庐陵担任知县,是年39岁。庐陵知县可以说是阳明龙场悟道后第一次展现治世才能的舞台,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其后来的事业发展却积累了宝贵财富。阳明的施政特点是政治上“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经济上“清驿递以延宾旅”,即重基础设施的修建,招徕旅客发展经济以惠民;教育上民,订立乡约,倡导孝悌忠义以文明社会;军事上“立保甲以弥盗”,百姓互助联保、官方联民保民以稳定社会秩序。^①不久升南京刑部主事,北京吏部主事、吏部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等职。

正德十一年(1516)阳明以左金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处,平定四地集结多年来的盗匪。当时的江西南部和福建汀州、漳州以及湖广边境一带,地处偏远,山险林深,盗贼盘踞,绵延数千里。这些盗贼互相勾结,伺机剽掠百姓,成为地方治安的隐患。有些匪首甚至自封为王侯,组织匪军攻掠府县,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阳明到任后,创行十家牌法,编十家一牌,列出籍贯、姓名、年龄、形貌、职业,每天由一家按牌巡察,遇有可疑者当即报官,隐匿不报者十家连坐。这一措施,有效遏制了吏贼勾结的态势,孤立了盗贼。军事上训练重用地方武装,使地方武装与官方正规军互相协作,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前后仅用不到16个月的时间,就平息了危害社会数十年的盗贼与叛乱。为了使社会长治久安,阳明进而订立乡约,建立学校,移风易俗,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的动乱局面。阳明由此被“远近惊为神”。后以吉安府为根据地,平定藩王宸濠之乱。

正德十四年(1519),继南、赣平乱之后,阳明又受命戡平福建叛军。行至丰城,得知宁王朱宸濠谋反,阳明急趋吉安勤王。宁王反叛后,北上九江,促趋安庆,窥伺南京,虎视京师,朝野震惊。阳明巧用反间之计,迟滞叛军。其后趁宁

^①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2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王后方空虚之机，围魏救赵，率兵直捣南昌。宁王回师援救，阳明率军迎战于鄱阳湖地区，击溃叛军，生擒宁王，收复九江、南康失地。一场发动数十万大军的叛乱仅用 35 天（一说 45 天）就彻底平定了，这充分显示了阳明的大智大勇。阳明的功业也因此到达鼎盛，不久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封为新建伯。

嘉靖六年（1527），朝廷起用阳明以原职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平定广西思恩、田州之乱。此前，思恩土官岑浚、田州土官岑猛相攻，被官军平定，撤去土官，更设流官统治。岑猛旧部卢苏、王受不服，聚众起事，并借交趾兵 20 万，攻陷田州、思恩府。提督两广军务的姚镆用兵无功，廷议起用阳明。阳明到任后，采取攻心招抚之策，遣散诸军，仅留土兵数千，解甲休息。卢苏、王受主动请降，田州、思恩二地之乱不战而平。但广西山高土恶，民俗凶悍，谚语称“广西民三而贼七”^①，即使良民到了本地，也多迁延变为盗贼。为了改变民俗，阳明积极在当地创办学校，兴建书院，倡导儒学，大兴孝悌之风，以企地方长治久安。至此，阳明本可以凯旋班师，但他看到断藤峡、八寨之瑶僮诸族频兴暴乱，围攻城堡，剽掠良民，“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诛之剧贼”^②，始终为朝廷心腹之患，“其可忧危，何啻十百于二酋者之为患”，^③于是阳明不待诏令，出其不意，移师突袭围剿，把这场“根株渊薮”百余年来连绵不断的暴乱一举荡平，西南边境得以安宁。

嘉靖七年（1528）十月，阳明肺病加剧，遂上疏告归，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于归途中卒于江西南安。听到阳明谢世的消息，南安“士民远近遮道，哭声振地，如丧考妣。”^④“丧过江西，军民无不缟素哭送者。”^⑤江西士民对阳明的感情之深不言而喻。《明史》如此评价阳明：“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⑥从某种意义上说，阳明功业，起始于江西，也终结于江右，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江右阳明弟子对乃师之追随与忠诚，也的确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实在没有辜负这位导师的企望。

^①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 1464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2。

^②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 1465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2。

^③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 463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2。

^④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 1324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2。

^⑤ 张廷玉：《明史》，第 5168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⑥ 张廷玉：《明史》，第 5170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二节 王阳明学术理路

阳明一生功业可谓赫赫,然而,正如他在正德十三年(1518)致友人信中所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翦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①在其坎坷仕途、戎马倥偬的一生中,阳明始终将主要精力致力于孔孟圣学的研究与体悟,并把自己的心得与实证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后学,使孔孟儒学有幸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在有明一代得到发扬与光大。

为了方便,我们暂将阳明思想理路分为“一志”“二期”“六变”。所谓“一志”即读书学习的终极目的是学圣成圣,据《年谱》记载,阳明11岁就认为读书的终极目的并非科举做官,“一日,与同学生走长安街,遇一相士。异之曰:‘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先生感其言,自后每对书辄静坐凝思。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龙山公(阳明之父)闻之笑曰:‘汝欲做圣贤耶!’”^②18岁拜谒明初大儒吴与弼的弟子娄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③弘治十八年(1505),34岁的阳明开始授徒讲学,“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④此后,“立志”一词经常出现在阳明的谈话、演讲、书信、甚至诗作中,“立志”一词已经成为阳明学说的“关键词”之一,用阳明的话说是“大头脑”^⑤。

“二期”“六变”是根据《明儒学案》的总结与归纳,参照钱德洪的《刻文录叙

①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24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②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2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③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22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④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2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⑤ 例如:“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先生曰:‘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57页、第12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说》^①,为了方便对所研究对象的理解,我们自行划分了阳明心学理路的动态图标。其实黄宗羲《姚江学案》已经将阳明的学术理路介绍得相当清楚,其概括之精当,对阳明心学理解之深入,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黄氏云: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②

“二期”是指阳明治学理路的前后两期,以“龙场悟道”为分水岭,悟道前,阳明从泛滥辞章始,中经遍读考亭(朱熹)、出入佛、老,终于龙场悟道,“得入圣门”;“龙场悟道”后期,从“默坐澄心”始,中经“江右”“默不假坐”,“居越”“益熟”,终于“开口即得本心”。前后两期各分三个发展变化阶段,总共为六,故称“六变”,具体说,“六变”即指阳明理学理路始于“泛滥辞章”终于“开口即得本心”等六个发展变化过程。以下是我们的具体说明:

悟道前(前三变),共有三变,是阳明心学形成阶段。

第一变,泛滥辞章。阳明自幼天资卓越,很小就表现出异常的文学天赋。

^① 原文如下:“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有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钱德洪撰:《刻文录叙说》,参见徐爱、钱德洪、董澐撰,钱明校理:《徐爱钱德洪董澐集》,第185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② 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第1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据记载,11岁所赋即兴之诗,已经令举座震惊。^①后来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经义,博览经史子集,辞章功夫大进。22岁会试落第后,回乡与魏瀚等联结诗社,对弈联诗。28岁进士及第后,与当时文坛巨匠李梦阳、何景明等交游联谊,仿写古诗文,颇享美誉。由于专心辞章,广阅文献,以致31岁时便积劳成疾,于是阳明感叹道:“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②,从此以后,淡于辞章,而有志于圣学。“虽然如此,其诗文风格飘逸,成就不凡,只是为其赫赫事功、心学成就所掩,少为人知罢了。”^③

第二变,探求至道。探求至道,研究朱学。朱子之学,在整个有明王朝,被定为官方哲学基础,是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普遍被读书人视为切入孔孟之门的必经之路。阳明早年就立志“读书学圣贤”,21岁中举后,遍求朱子之书研读,端坐省言,以仿圣人形象。一天,根据朱子“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之训,便取官署竹子为“格之”对象,默坐苦思七天,以探究竹子之理,终无所得,结果以病告终。27岁时读朱子“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于是后悔之前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继而改为循序以格物,略有收效。但总感到“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无法契合圣学旨归。沉郁既久,乃至旧病复发,深感自己无成圣贤之天分。面对渺茫的求圣之路,阳明甚至产生“遗世入山之意”,转向佛、老以求至道也是自然之理。

其次,探求至道,出入佛、老。阳明早在17岁赴江西完婚之时,就曾入道教铁柱宫,叩问养生之道,学习导引之术,与道士对坐乃至忘归。格物穷理失败后,又引起阳明对道教的浓厚兴趣,甚至有入山修炼之意念。进士及第后,奉命审录江北囚狱,游九华山无相寺、化城寺。归越后筑室阳明洞,静坐修炼。后又游西湖诸寺院,接触了禅宗顿悟法门,对佛法多有涉猎。但后来渐渐觉得释、老毕竟主张出世,似乎背离人类“爱亲本性”,随后渐渐对释、老的世界观产生怀疑。33岁时,主考山东乡试,试录皆出阳明之手,“其策问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由于名器太滥”,^④到此为止,阳明对释、老的

^① 龙山公迎养竹轩翁(阳明祖父),因携先生如京师,先生年才十一。翁过金山寺,与客酒酣,拟赋诗,未成。先生从傍赋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大惊异,复命赋蔽月山房诗。先生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参见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2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②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22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③ 王阳明撰,于自力等注译:《传习录》,第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④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2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怀疑态度,更趋明显了。弘治十八年(1505),34岁的阳明开始授徒讲学,“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①并与湛若水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己任。

第三变,龙场悟道。阳明之学理路的真正转折点应该是“龙场悟道”。正德三年(1508),阳明“居夷处困”,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忽然在一天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②“龙场悟道”后,阳明算是真正踏进圣人的心学之门,比较透彻地印证了《五经》实相,因著《五经臆说》之作。至此以“求理于吾心”否定了朱子格物以穷理的认识论,长期困扰着阳明的物理与吾心判然为二的疑团终为释然,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心学根基。

悟道后(后三变),是阳明心学成熟阶段,共历三变。

第一变,“默坐澄心为学的”。悟道后的阳明,真实体验到圣人之境,人人本来具足,不须假借外求,若靠格尽外界万物以求至道,万物不尽而至道不得,因此“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③在默坐中澄心,在澄心中收敛,在收敛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使自己的心念不随视听言动而跌宕起伏,使自己意识不因外界客尘的骚动而冲动不已,使自己心态恒而有定,专注一贯。他发明《大学》古本的宗旨,主张“大学之要,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而所谓格物,是格去心中之物,并非格去外界万物。具体方法,学者应诚意息虑、默坐澄心,“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

第二变,江右历练期。江右是阳明建功立业的根据地,也是其辉煌事业的起止点,其道业历练渐趋成熟也基本在此完成,正如黄宗羲所云:“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④在此过程,阳明事业如日中天,但事业成功却伴随着惊涛巨浪,险象四起,此时阳明更加坚信自己的“良知”的真实不虚与可贵之处,更

^①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2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②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22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③ 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第1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④ 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第1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加真实地体悟到“知”与“行”的绝对统一与不可分割,因此,平定宁王前提出“致良知”之教,主张“致知者,诚意之本;格物者,致知之实”“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在此期,阳明认为人的心态的静与动并非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的静与动,肉体的静态也并非意味心态的宁静,相反,肉体的活动也并非意味着心态的骚动。静为体,动为用,能静能动才称为真静。

第三变,“居越”成熟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里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①“时时知是知非”,心意可谓寂静专一,可否印证了孔子的“不惑”之境界?“时时无是无非”,心境可谓光明澄澈,是否印证了孔子的“耳顺”之心态?“开口即得本心”,可否切入孔子的“随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界?特别是嘉靖三年(1524)中秋之夜,在天泉桥宴会上,阳明与百余门人,或歌唱,或投壶,或击鼓,或泛舟,率性而不失分寸,狂热而不失庄严,这是否已经印证了长安街相士的“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的预言?阳明所赋《月夜二首》,是否是“天泉证道”的本心流露?^②所有这些问题,值得后人探究。

至嘉靖六年(1527)出征广西前夕,又应大弟子钱德洪与王畿所请,在天泉桥阐发了“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阳明心学宗旨,并肯定了王畿所言“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这就是“四句教”和“四无说”,史称“天桥证道”。

当然,对于“王门四句教”的有与无,学界尚存争议。刘宗周认为,“王门四句”,“盖阳明先生偶一言之,而实未尝笔之于书为教人定本,龙溪辄欲以为己说笼罩前人,遂有天泉一段话柄。甚矣,阳明之不幸也!”^③又说:“予以为此(四句)非子(阳明)之言,而王先生(畿)之言也。子所雅言,‘良知’而已矣。又曰‘良知即天理’,为其有善而无恶故也。知是有善无恶之知,则物即是有善无恶

^① 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第1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② 《月夜二首》:第一云:“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霭忽然生。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第二首云:“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786—78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③ 刘宗周撰,吴光等编校:《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450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